

先秦漢初雜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

李隆獻

摘要

本文以先秦、漢初最為卓然特立的「雜家」《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為考察對象，探論其學術傾向、關注議題及其呈顯的「孔子形象」。

一、雜家之學以兼採各家之長為方法，故其引用對象遍及各家，難以藉由其文獻來源證實其學術思想傾向，但考察其引用文獻之偏好與用途，可知《呂氏春秋》特意避開《莊子》創發的獨特孔子形象，且皆援引孔子事蹟為其論點之依據，可見其接受的孔子形象較符合傳統認知；《淮南子》則多因襲道家文獻，接受《莊子》變創的孔子敘事。

二、《呂氏春秋》關注「君臣遇合」議題，重視孔子以布衣干君求用的故實，又藉孔子之口闡發不得志者的自處之道；《淮南子》則倡導兼取並用之美，故或以孔子雖為聖人仍有所不能為喻，說明各家學說皆有不足，或盛讚孔子兼備弟子之材，標榜融匯兼取的雜家學說。

三、二書皆以孔子的「老師」身分闡述「學」的觀點：《呂氏春秋》重視「學」的效用，故孔門弟子皆顯榮聞達；《淮南子》則以學為殘生害性，故著重描寫孔門弟子之夭病死傷。

四、二書之「孔子曰」／「仲尼曰」可區分為三類：一是作為「評論者」；二是藉孔子之言，闡述事理，唯此事理並不屬於儒家學說；三則是以孔子之言為《老子》注腳，即在「孔子曰」論述之後，添加《老子》原文，使「孔子曰」成為老子哲理的闡發者。《呂氏春秋》採用了前兩

2016/12/20 收稿，2017/2/15 審查通過，2017/6/26 修訂稿收件。

* 李隆獻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DOI:10.30407/BDCL.201806_(29).0005

類，《淮南子》則三類兼具。無論其用途為何，皆反映先秦漢初以孔子為儀表的思想趨勢。

關鍵詞：孔子形象、雜家、《呂氏春秋》、《淮南子》

The Images of Confucius Presented in Documents of Zajia during Pre-Qin and Early Han Period

Lee Long-shie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images of Confucius, the academic trends and issues presented in two books, *Lüshi Chunqiu* (*Spring and Autumn of Master Lü*) and *Huainanzi* (*Masters from Huainan*). Even though the method of zajia is to assimilate idea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in down any clear textual attitude regarding its presentation of Confucius, tendencies or preferences still can be found from the documents cited. For example, *Lüshi Chunqiu* purposely avoids the particular image of Confucius presented in *Zhuangzi*, but cites some of Confucius' behaviors, from which we can see *Lüshi Chunqiu* seeks to fit in with the more conventional conception. On the other hand, *Huainanzi*, regarded as a Daoist document, adapts presentation of Confucius in *Zhuangzi*, the refashioned image of Confucius is thus endowed wit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econdly, *Lüshi Chunqiu*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King and his counselors, so it puts more emphasis on presenting how Confucius seeks to offer political solutions for the King and how a noble person could behave himself even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On the contrary, *Huainanzi*, with the aim to celebrate the eclectic aesthetics of zajia which avoids limitation of a single perspective, conveys that even Confucius as a saint is unable to teach everything, but it is his various abilities (instead of one) t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other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eople including his disciples. The two books also explore the issue of learning and Confucius as a teache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üshi Chunqiu* emphasizes the advantage of learning by showing the cases of his renowned disciples, while *Huainanzi* points out the disadvantages of learning by showing the cases of his disciples' death and illness. Finally, there are different usages of "Confucius" or "Zhongni" in these two books,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as a commentator in line with his conventional image; 2) when having teachings other than Confucianism put into his mouth; 3) when celebrating ideas of *Laozi*, by presenting Confucius' words as supporting texts of *Laozi*. *Lüshi Chunqiu* adopts the first two usages, while *Huainanzi* adopts all of them. The presented images of Confucius in both of the two books reflect tendency to see Confucius as a great model during Pre-Qin and Early Han Period.

Keywords: images of Confucius, Zaijia (the eclectics school), *Lüshi Chunqiu* (*Spring and Autumn of Master Lü*), *Huainanzi* (*Masters from Huainan*)

一、研究方法與材料論略

在漫悠的中國歷史文化長流中，學術之濫觴或可推源於孔子。孔子之前，《易》乃卜筮之書，《書》與其它史官著作似乎僅供統治階層鑑往知來，《詩》、《禮》則屬貴族之言行準則。除此之外，似未有脫離尋常日用之著作及思想傳世，唯有老子，其人其書是否先於孔子，學界至今猶紛呶不休，未有定論。¹

世界各民族在形成正式的歷史、文學文本之前，應該都經歷過口傳的時代，中華民族當不例外。²當正式的文本形式成為經典時，前此的神話、

¹ 關於老子的生平與年代，《史記》已語焉欠詳，造成此一問題的根本原因，乃是載述孔子問禮於老子，似老子年壽長於孔子；然《老子》書多有戰國特色，兩相矛盾，因而聚訟紛紛。前賢關於此一問題，約有三說：或以為《老子》作者即孔子問禮者，以胡適、嚴靈峯為代表；或區分著書的老子與孔子問禮者為二，以清儒汪中、近賢錢穆為代表；或據《老子》之語言、用韻、語法，主張《老子》出於戰國中晚期，有梁啟超等人。地不愛寶，出土材料中亦屢見《老子》，如1973至1974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甲、乙本《老子》，其中甲本不避劉邦諱，疑劉邦即位（西元前202）前寫本。此二本並《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據此推測，帛書本《老子》可能屬法家傳本。1993年湖北荊門市附近挖掘的郭店一號楚墓，出土大量竹簡，中有《竹簡老子》，出土時已經散亂，抄寫在三種不同形制的竹簡上，據周鳳五先生研究，「甲組《老子》是一個經過戰國時代儒家學者改編的本子，儘量淡化道家宇宙論與形上思想的色彩，並刻意修改文字，避免與儒家『五行』之說正面衝突，是一個已經『儒家化』，甚至『子思學派化』了的道家經典」，而「乙組《老子》……內容著重君子的立身處事之道，強調相對立、無為、清靜，完全不採錄《老子》的宇宙論。丙組《老子》篇幅更小，僅僅摘錄君人南面之術與自然、無為之說」（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收於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4）。2009年北京大學獲贈西漢竹簡一批，其中《老子》現存約5300餘字，乃目前保存最完整之出土竹簡《老子》，推測抄寫時間約在漢武帝後期到宣帝以前（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綜上可見《老子》受到各學派的廣泛傳抄，然對於老子其人之史實考訂，並無突破性的進展。參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47-48。嚴靈峯：〈辨老子書不後於莊子書〉，收於嚴靈峯：《無求備齋學術論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頁171-202。〔清〕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點校：《老子考異》，收於〔清〕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點校：《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0年），頁143-148。錢穆：《老子雜辨》，收於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年），頁202-226。梁啟超：《梁任公學術演講集》第1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頁17-21。

² 此議題涉及中國早期書寫型態發展、文獻流傳方式、口頭與書面文本互涉等多重面向，遠非本文所能論及，相關研究可參考〔美〕柯馬丁（Mattin Kern）著，李芳、楊治宜譯：

傳說、歷史、文學必定成為歷史／文化記憶。德國精研埃及文化的人類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曾提出古代文明建構「文化記憶」的理論，認為：文化記憶指某一群體所共有而超越時空限制的記憶；正如個人記憶對個體產生自我意識之重要性，文化記憶對群體的認同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奠基、定型作用；文化記憶的載體有儀式、節日、經典文本等多種不同形式。承載文化記憶的文本，通常經由特殊機構保存與編輯；傳播、教學與解釋文本的人員，大抵具有政治、社會上相對獨立的地位或身分。³而「經典文本」的歷史／文化記憶，歷經某些年代／時代，必定會因為改寫／重寫而再度成為另一種「文本」。誠如張光直先生所指出的：文獻呈現的思惟／觀念，代表的應是寫作的年代，而非書寫的歷史年代的史實或史觀。⁴如《史記》代表的應是西漢初年的政治、歷史、思想背景與司馬遷的史觀與思惟，而〈五帝本紀〉蓋即司馬遷基於其歷史／文化記憶與經典文本《尚書·堯典》改寫／重寫而成的另一「經典文本」，而不是五帝時代的歷史。由此可見，前一時期或某些時期的歷史／文化記憶，可以因著不同時代、作者的改寫／重寫而有不同的側重與面貌，其所代表的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說的乃是該時期／時代與作者個人對該歷史／文化記憶的重新詮釋，必然帶有該時代的價值觀與作者個人的創作意圖。

孔子作為春秋時代／中華民族的思想巨擘，並被公認為儒家的宗師，其後更被賦予政治、教育、文化極高、極大的意義，其言行舉止必然是春秋末期士人的歷史、文化記憶無疑。戰國以降，無論具有經傳、史學性質的《左傳》，或具有「語體」而深具教化性質的《國語》，以及戰國諸子都重新書寫了孔子這個人物的歷史、文化記憶；諸子更力圖以其型塑的「孔子形象」掌握發言權，闡發自己學派的理論，希望可以說服諸侯乃至帝王，

〈方法論反思：早期中國文本異文之分析與寫本文獻之產生模式〉，收於陳致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49-385。

³ 〔德〕揚·阿斯曼（Jan Assmann）撰，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與政治身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本文側重於「經典文本」的書寫與詮釋，與揚氏略有不同。

⁴ 張光直〈商周神話之分類〉：「所謂先殷神話，就我們所有的文獻材料來說，實在不是先殷的神話，而是殷周時代的神話。……它們未必就是先殷的史實。殷周的神話中，有無先殷史料，乃是第二步的問題。」收於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頁287-288。張先生雖旨在討論古代神話故事，然此觀念實適用於吾人面對各種時代難以確證、文本層次複雜的先秦文獻。

達到政治與教化的目的，自儒家的《論語》、《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莊子》、法家的《韓非子》莫不如此。

中國之學術既可能發軔於孔子，孔子也對此後之學術思想發揮難以估量的影響力，戰國諸子或祖述其說，續加闡發；或針鋒相對，質疑論難。各家對孔子的認知自不盡相同，又或因其學派需要與個人企圖而特意變造，爰此，孔子形象之紛呈多樣實屬必然。

筆者曾撰〈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⁵，就詮經、敘史、諸子等不同性質的文獻，探論「孔子形象」的變嬗，歸納出「良臣」、「老師」、「聖賢」三種形象，此三種形象又因不同的時空情境、學派立場、文獻性質，甚至不同創作者的個人觀點而各有偏重。如《左傳》因重視各國政治事件、國際形勢與人物作為的「記事」特質，相對完整提供了孔子作為政治人物／「良臣」的行事載述；其重視道德與偏儒家立場則表現於強調、推崇孔子的「老師」身分與預述孔門弟子的關係等層面。《國語》則傾向記言，重視「嘉言善語」，其載錄孔子各種展現博學之材的言論，使其較《左傳》更傾向「博物多聞」；而其採用的「對問」形式，更是由師弟問答擴充至君臣問答，然其本源仍是孔子的「老師」形象。《孟子》則是先秦文獻中率先提出「孔子作《春秋》」議題者，並以此申說孔子傳承文王、周公之道統，形塑孔子之「聖賢」形象。《史記》進而融裁漢代以前文獻的孔子事蹟，著力描寫孔子之「良臣」形象，更連結「不用」之際遇與其學術事業，成功融合「聖賢」與「老師」形象。筆者又於〈《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析論「道家」學派的「孔子形象」，指出《莊子》雖也採取孔子「博聞多識」的「老師」形象，卻翻轉、顛覆其意涵，促使吾人深入反思「知識」、「生命」與「道德」等議題。⁶《列子》雖與《莊子》同為道家文獻，但所述與先秦諸子既定的「孔子形象」並無太大不同，也少抨擊孔子或儒家後學的篇章，可能是增入了漢代以後文獻的結果。凡此，在在顯示敘事意圖與敘事形式對形塑「孔子形象」的影響，也是重寫歷史、文化記憶的必然結果。

⁵ 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21-76；收於李隆獻：《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45-110，「壹」的部分。

⁶ 李隆獻：〈《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東亞觀念史集刊》第8期（2015年6月），頁311-341。

尚有可論者，乃「雜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雜家」是否能成為學派，歷來學者多所論議，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雜家類敘》云：

考周秦諸子，未嘗有雜家之名。惟《荀子》嘗言「雜能旁魄而無用」，楊倞注以「雜能」為多異術，或即指雜家之徒言之。然當時所言學派，究無此名；而為此學者，亦未嘗標雜家之名。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亦無雜家。雜家之名，蓋起于劉歆、班固簿錄群書之時。故所為《七略》、《藝文志》，悉以書分類，不依人分類。其於兼括諸家之書，不能分隸於諸家之下者，盡歸之雜家焉。斯名既立，後之簿錄群書者多因之耳。⁷

張氏認為先秦文獻未見「雜家」之名，而今所存雜家文獻亦不以「雜家」自稱，可見先秦並無「雜家」概念，雜家亦無共同之自我認知，遂謂雜家並非「學派」名稱，而是《七略》、《漢志》因其不能分隸諸家者，遂盡歸之雜家，後世因之。亦有學者因雜家未有一貫宗旨，質疑「雜則非家」，如江璣〈論九流之名稱〉云：

既曰雜，則並畜兼收，宗旨必不純一。古之名為一家之學者，必有純一之宗旨，以貫徹其初終。既雜矣，何家之可言？雜則非家，家則不雜，不可混而一之。⁸

以上質疑，導因於以學術立場區分學派，認為雜家缺乏一貫宗旨，是以不能成「一家之言」。

今存最早界定「雜家」涵義者當推班固《漢書·藝文志》：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⁹

⁷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收於張舜徽：《舊學輯存》下冊（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頁1804。

⁸ 江璣：〈論九流之名稱〉，收於江璣：《讀子卮言》（臺北：泰順書局，1971年），卷1，頁22。

⁹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999。

細審班固之言，雜家之宗旨即在「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所謂「國體」、「王治」，顏師古注以為即「治國之體」、「王者之治」，¹⁰可見雜家特別重視治術效用。潘俊杰〈先秦雜家的特徵〉云：

雜家的學術宗旨正是《漢書》「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和《隋書》中所言「見王治之化，無所不貫者也」，即把政治實用主義的「王治」作為其學術思想的最終目標和宗旨。¹¹

明白指出雜家之目的為明確的政治實用主義。而《漢志》「兼儒、墨，合名、法」，當理解為雜家所使用的方法乃有意識兼取各家學說之長，呂思勉云：

諸子之學，除道家為君人南面之術，不名一長外，餘皆各有所長；猶人身百骸，闕一不可；故曰「知國體之有此」。雜家兼容而並苞之，可謂能攬治法之全。¹²

呂氏指出，雜家追求治術的目的與其兼取諸子之長的方法之間，其實互為表裡，正因其目的在政治實效，故方法上網羅眾論，捨短取長。程千帆〈雜家名實辯證〉則賦予雜家新的定義：

雜家者，百家所從入，期於治最切，蓋秦學也。¹³

程氏之說顯較《漢志》明確，且避免雜家缺乏明確宗旨的誤解。然若如此定義「雜家」，似嫌不足，如陳志平即以為當區分「目錄學上的雜家類」與「思想史上的雜家」，¹⁴並謂：

¹⁰ 顏師古注「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第6冊，頁2999)。

¹¹ 潘俊杰：〈先秦雜家的特徵〉，《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1期（2008年1月），頁154。

¹²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67。

¹³ 程千帆：〈雜家名實辯證〉，收於程千帆：《問堂文叢》，收於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7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98。

¹⁴ 陳志平：〈雜家考論（下）〉，收於方勇主編：《諸子學刊》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11。

《七略》、《漢志》小序論雜家類特點，取「兼儒、墨，合名、法」之義，實是思想史之雜家；而其本身又是書籍目錄，故又用「漫羨而無所歸心」之義，以囊括諸書。¹⁵

所謂「諸書」，指的是雖列於「雜家」，但既不屬於思想史中的雜家學派，也無法歸入任一學派的書籍，即雜家類小序雖說明了思想史上的雜家特點，但也提到其所列之書包括無可歸屬於其它學派的書籍。清儒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諸子第十四》即云：

《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為龍蛇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¹⁶

實齋雖旨在說明後世書目率意歸納宗旨／學派不明之書於儒、雜二家，唯上溯《漢志》，其所指出〈諸子略〉的儒、雜二家之書實已標準不一，難怪後世淆亂難分。

本文述論限於先秦漢初之《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自《漢書·藝文志》至《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之書或有出入，然未有擯除此二書於雜家之外者，可見各家書目對雜家之認知雖有歧異，然此二書向來符合各家對「雜家」之理解。田鳳台云：

觀夫前漢雜家之書，其足稱者，《呂氏》而外，《淮南》、《論衡》，然《淮南》泛採而逞文，《論衡》博收而乖說，其採雖博，非皆以治道是尚。自斯而後，雜家不純。¹⁷

田氏雖對《淮南子》與《論衡》有所不滿，但亦認為純然雜家者唯《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三書而已，三書以外則「雜家不純」。然而《論衡》是否宜歸雜家，尚有可議。《漢志》區別諸子為十家，乃針對先秦至漢初之學術立論；東漢以降的思想家，如亦強合於此十家，恐不免牽強之

¹⁵ 陳志平：〈雜家考論（下）〉，頁315。

¹⁶ [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靳斯點校：《校讎通義校注》，收於[清]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038。

¹⁷ 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1。

嫌。¹⁸《論衡》一書，其目的既非出於政治實用，其方法亦非有意兼採各家學說，如田鳳台即云：

王充思想，紛歧雜出。其於先秦諸子之學，或有所承，難言所宗。……與《呂氏》、《淮南》之書，相近而難相企。要皆因其隨事立說，不能自持所致也。¹⁹

由「或有所承、難言所宗」，可見田氏並不肯定《論衡》具備雜家學派有意兼取各家之長的特色，是以《論衡》在書目中雖歸諸雜家，當出章學誠所言「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而非具有學術上的雜家特質。程千帆認為：

呂氏成書，所以備一代之典要，固純乎雜矣。而其他學雖雜出，或各有所長。……《淮南子》則章學誠所謂「自托於道家之支流」者也，要之不害其為雜家，以其通眾家之意，而成一家之言也。²⁰

由「固純乎雜矣」之評，具體可見程氏肯定《呂氏春秋》為雜家中之粹然者，而《淮南子》雖自托於道家，但其書融會眾家而成，亦足以為雜家學派之代表。

本文旨在述論《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的「孔子形象」及其成因與特色。二書之撰作時代有別，社會背景亦異，說另詳下文二之（一）、三之（一）。

二、《呂氏春秋》「孔子形象」的承轉與特色

《呂氏春秋》乃第一部有意識兼取各家之長以成經國之典的著作，其編纂目的迥異先秦諸子，其所反映的時代特色也不同于其它學派。《呂氏春秋》的「孔子形象」亦然，既有傳承先秦文獻的孔子形象，亦有其特出之

¹⁸ [唐]魏徵等：《隋書·經籍志》（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頁906，略謂：荀勗《中經新簿》因循鄭默《中經》，改《漢志》之「六略」分類為「四部」分類法，並分乙部為「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等子目，而不採傳統「九流十家」的子目分類，蓋即考量近世子家在思想體系上的獨特性，難以附會於先秦「九流十家」之中。

¹⁹ 田鳳台：《王充思想析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41-42。

²⁰ 程千帆：〈雜家名實辨證〉，頁199-200。

處。茲先略述《呂氏春秋》的成書背景與編纂動機，次論其「孔子敘事」之取材，再論其所形塑「孔子形象」的特色。

(一)《呂氏春秋》成書年代、編纂動機與思想特質

《史記·呂不韋列傳》載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十年以嫪毐事牽連免相，十二年徙蜀自殺。²¹《呂氏春秋》成書年代向有二說：一說採《呂氏春秋·序意》言「維秦八年」，即秦莊襄王滅周後八年（秦王政6年）；一說採《史記·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秦王政10年。陳奇猷考證二說，以為〈十二紀〉成於秦王政6年，〈八覽〉、〈六論〉成於遷蜀之後。²²王利器則在陳說的基礎上以為〈六論〉、〈十二紀〉作於秦王政6年，〈八覽〉則呂不韋死後門客所作，此乃考量呂不韋遷蜀後二年即歿，未必能完成〈六論〉、〈八覽〉。²³二說皆以為《呂氏春秋》非成於一時一地，然二說皆乏決定性證據，唯可說明此書約略成於秦一統天下以前。《呂氏春秋》成書時代雖難確考，但由司馬遷〈報任安書〉與《史記·太史公自序》並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言衡之，史公既以韓非與呂不韋並舉，而〈說難〉、〈孤憤〉皆成於韓非囚秦之前，是則《呂覽》之成書時代亦極可能在「不韋遷蜀」之前。

呂不韋著書目的，古來說法不一，司馬遷謂不韋自恥不如戰國四公子之多賓客，遂亦招士至食客三千：

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²⁴

²¹ 《史記·呂不韋列傳》，〔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京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年），卷85，頁9。

²² 參陳奇猷：《〈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收於陳奇猷：《晚翠園論學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2-135。

²³ 參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序〉，收於〔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12-16。

²⁴ 《史記·呂不韋列傳》，〔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85，頁10。

史遷謂不韋有意著書，以與戰國諸子一別高下。唯此意圖似嫌不夠明確。錢賓四先生則主不韋有取秦而代之意，《呂氏春秋》即其具體主張：

余疑此乃呂家賓客借此書以收攬眾譽，買天下之人心。儼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歸諸呂氏。如昔日晉之魏，齊之田。為之賓客舍人者，未嘗不有取秦而代之意。即觀其維秦八年之稱，已顯無始皇地位。當時秦廷與不韋之間，必有猜防衝突之情，而為史籍所未詳者。始皇幸先發，因以牽連及於嫪毐之事。不韋自殺，諸賓客或誅或逐，其事遂莫肯明言，而乃妄造呂政之譏，與嫪毐自不韋薦身之說，因為當時誣史之說而已。²⁵

蕭公權先生採錢賓四先生之說，又加推闡，並論《呂氏春秋》之思想云：

蓋呂氏欲代秦自立，則勢必攻擊秦之傳統政策而別樹立國之道。……是呂書不徒致譏於始皇，實儕秦於六國之列，並孝公以來所行富強兼併、任法尚功之政而根本否定之也。吾人既知《呂氏春秋》為反秦之書，則其重己貴民道體儒用之政治思想，乃針對商、韓而發，毫不足異。〈十二紀〉中持論每陰抑法家。先秦諸子如孔、墨、黃、老、莊、列、管、田、子華等均在稱引之列，而未嘗一及申、商、韓非。……故呂書之政治意義為立新王以反秦，其思想之內容則為申古學以排法。²⁶

諸說並不矛盾，或可並存。至其思想，則融會先秦各家學說，自儒、道、墨、法、陰陽五行等學派汲取養分，²⁷以成一家之言。首為此書作注的高

²⁵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487-488。

²⁶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年），第 4 章，第 3 節「呂氏春秋」，頁 359。

²⁷ 徐復觀云：「《呂氏春秋》全書，係統合儒、道、墨、陰陽五行思想而成。」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 2 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頁 2。牟鐘鑒云：「書中容納的老莊的天道觀和法天地的思想，墨家首功利主尚賢的思想，儒家別貴賤重教化的思想，陰陽五行家論陰陽序五行的思想，法家重法審勢的思想，以及義兵、重農等思想，它們之間本來就不互相矛盾。」見牟鐘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頁 31。綜合二家之說，可知《呂氏春秋》之學雜有儒、道、墨、法、陰陽五行五家學說。

誘於〈呂氏春秋序〉總括此書之大旨云：「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²⁸可見其思想蓋以儒家為宗。²⁹

（二）《呂氏春秋》「孔子敘事」之取材

正如《呂氏春秋》兼取諸子立說，其「孔子敘事」亦多所踵承，相似記載見諸《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文子》、《尸子》、《公孫龍子》、《左傳》、《國語》等文獻，可見《呂氏春秋》取材之廣。然而「引述」與「被引述」之間實不僅止於複製而已，而存在多樣而複雜，甚至斷裂的關係。《呂氏春秋》顯然有其取捨標準。以先秦文獻創造出最具顛覆與變創之「孔子形象」的《莊子》而言，《呂氏春秋》僅從中引述兩則敘事，其一見〈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

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

「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

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

²⁸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 28。劉咸忻〈呂氏春秋發微〉闡發此段意涵云：「道德故儒、道之所同，無為亦儒、道、法家同有之目的，而虛靜無為則道家之所詳，即合天道之說也。公方為檢格則儒家之所詳，及修人（按：「人」蓋「仁」之誤）義之說也。忠義為品式者，亦即儒家之仁義。」見劉咸忻《劉咸忻學術論集（子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87。綜合而言，屬儒家者四、屬道家者三、屬法家者一，可見其旨歸。

²⁹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117，頁 14 下，論《呂氏春秋》云：「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持論頗為不苟。」

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³⁰

此蓋本諸《莊子·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³¹

文中載述孔子厄於陳、蔡，回答弟子質疑何以君子而有此遭遇，進而提出對窮達的看法。此事蓋據《論語·衛靈公》鋪衍：

³⁰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532-1542。

³¹ 〔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頁981-983。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³²

參較之下，《莊子》較《論語》增添更多細節，人物對話更為生動，但基本上不違史實，其所闡發之窮達觀也與儒家思想無異，表現出雖厄處窮困，仍執守仁義的積極態度。《呂氏春秋》更增添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³³晉文公遇驪姬之亂，流亡各國，過曹，為曹共公所辱；³⁴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而降，棲於會稽三事為例，³⁵說明處困辱而能堅持，終能成就大事。然而同樣是「窮於陳蔡」的情節在《莊子·山木》則有不同的鋪衍：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何谓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³²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15，頁1。本文引用《十三經》之《經》、《傳》、《注》、《疏》、《校勘記》，皆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20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刻本。

³³ 事詳莊9年《左傳》、《國語·齊語》、《呂氏春秋·貴卒》。茲不繁引。

³⁴ 事詳僖23年《左傳》、《國語·晉語四》、《呂氏春秋·上德》。茲不繁引。

³⁵ 事詳哀元年《左傳》、《國語·吳語》、《國語·越語上》、《呂氏春秋·順民》。茲不繁引。

「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³⁶

同樣以阨於陳、蔡為背景，〈山木〉之孔子與弟子的問答又不同於〈讓王〉。文中孔子擔憂顏回誤認其志向遠大而萌生進取之心，憐惜自己之遭遇而生悲哀之情，因而提出隨順任化、安晏自適的思想主張。此段文字主在闡發道家思想，情節已背離史實，自屬《莊子》之創發。《呂氏春秋·慎人》取〈讓王〉而捨〈山木〉，實乃捨道取儒，與其思想傾向儒家息息相關。

其二見〈精論〉：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³⁷

此蓋本諸《莊子·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

³⁶ 〔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690-694。

³⁷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2162。

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³⁸

《呂覽·精諭》、《莊子·田子方》皆述孔子見溫伯雪子事，〈田子方〉之溫伯雪子疑為《莊子》作者杜撰的有道之士，對比中國之民嘵嘵不休「明乎禮義」的行為，孔子「見之無言」則表現出「知人心」的特質。如此描述，孔子形象恰與「明乎禮義」相對，為《莊子》有意的倒反，意在譏彈儒家禮義的虛矯。但在《呂氏春秋》的引述，省略溫伯雪子對「中國之民」的評論，便使此一敘事聚焦於「聖人不待言而相知」的寓意，進而避免譏評禮義的孔子形象。

由上述二則援引《莊子》事例，即可具見《呂氏春秋》雖亦取材對孔子形象有較多變創性的道家文獻，但或捨去《莊子》運用「諧擬」與「倒反」所塑造的獨特「孔子形象」，³⁹或藉由刪省敘事，避免呈現《莊子》顛覆的孔子形象，凡此皆可證《呂氏春秋》的孔子不出先秦普遍流傳的傳統孔子形象。

此外，對同一故實而有不同的詮解，亦可反映對孔子地位的不同認知，如〈義賞〉云：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

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³⁸ 〔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704-706。

³⁹ 其詳可參李隆獻：〈《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頁311-341。

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⁴⁰

此則述晉、楚城濮之戰，⁴¹晉文公問計於咎犯與雍季，採咎犯之謀而終得勝利，戰後封賞卻以雍季為上；並引孔子之言給予晉文「足以霸」的評價。《韓非子·難一》所載略同而文稍異：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⁴²

二書針對孔子的評論顯有不同認知。《呂氏春秋·義賞》於「孔子聞之曰」後續云：

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⁴³

⁴⁰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484-1488。

⁴¹ 城濮之戰見僖公25年至28年《左傳》，其詳可參李隆獻：《晉文公復國定霸考》，收於羅聯添、徐泓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7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8年），第6章，第2節，頁252-262。

⁴² 〔戰國〕韓非撰，張覺校疏：《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933。

⁴³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490-1493。

《呂覽》認為人君之獎賞將導致人民的刻意追求，由此而引領風氣。風氣不善，將招致敗亡，是以人君之賞罰須慎重考慮是否合於義。《韓非子·難一》之載述則異乎此，在「仲尼聞之曰」後又云：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⁴⁴

文中詳論是非，先批評雍季之答不切實際，接著肯定舅犯用詐乃是詐敵而非詐民。舅犯有二功而賞後雍季，實賞罰不當，以此駁斥孔子對晉文公「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的肯定評價。《呂氏春秋·義賞》、《韓非子·難一》俱引晉文公之問與「孔子曰」闡明論旨，可見孔子之言論已屬當時流行之說。《韓非子·難一》顯係針對當時盛行的儒家學說提出詰難，《呂氏春秋》則接受儒家學說，為其背書。二者雖皆引述同一故實，但因學說立場不同，《呂覽》贊同孔子所論，《韓非子》則駁斥孔子之言，二書之宗旨與思想自然呈現，而其思想傾向也導致孔子地位與形象的迥然殊異。

省察《呂氏春秋》的取材與引述，可見其對孔子形象的認知較偏儒家立場，故雖亦引述《莊子》之文，但捨棄《莊子》較具顛覆性的孔子形象敘事。就其引述孔子之言的立場，《呂氏春秋》與《韓非子》截然不同，前者多引孔子之言以為佐證，後者則徵引而加以反駁，由此可以具見《呂氏春秋》對孔子的推崇及偏儒家的學術立場。

⁴⁴ [戰國]韓非撰，張覺校疏：《韓非子校疏》，頁934-935。

(三)《呂氏春秋》所載「孔子形象」的特色

《呂氏春秋》所載孔子事跡，雖或前有所承，唯亦有別具特色者：首先，孔子作為事件、人物行止的權威評論者，往往出現在事件之末，用以臧否褒貶、評價善惡。如〈去私〉載：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⁴⁵

晉平公兩度詢問祁黃羊任官的適當人選，祁黃羊親、仇兩無隱，薦舉皆適任，並獲國人肯定。《呂氏春秋》為強調此一事件的寓意，援引孔子為評論者，對祁黃羊處事公正給予正面評價。此類「孔子曰」、「孔子聞之曰」的用法，始自《左傳》、《國語》，先秦諸子踵承之，且往往稱引作為評論、說理之依據。至於何者為孔子之真實言論，何者乃藉孔子之口以為「重言」，則界線頗難論定。如若考慮文獻與故實流播產生之「傳聞異辭」，則情況更為複雜，如本則故實可能源自襄3年《左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⁴⁶

⁴⁵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30-134。

⁴⁶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29，

《左傳》繫此事於魯襄 3 年，當時晉君為悼公而非〈去私〉之平公。事亦見載《國語·晉語七》：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⁴⁷

魯襄 3 年即晉悼 4 年。〈晉語〉謂「祁奚辭於軍尉」，祁奚因晉悼之問，遂薦舉其子祁午。《左》、《國》並謂祁奚「請老」，晉悼在位十六年而卒，子平公嗣立，距祁奚請老已十二年，晉平公不太可能徵詢早已退休的祁奚，祁奚甚至可能早已辭世。《呂覽》之作「平公」，或因〈晉語七〉文末「歿平公，軍無秕政」而誤。三書對事件之因由亦有所不同：《左》、《國》乃晉悼詢問祁奚退休後之繼任人選，《呂覽》則是詢問南陽令與軍尉二職之適任人選。除去這些差異，《呂覽》的「孔子曰」極可能源自《左傳》的「君子曰」，⁴⁸《呂氏春秋》改《左傳》「君子曰」為「孔子曰」，一方面可能記載了同一故實的不同版本，更可能出於對「孔子」作《春秋》的認知而認為《左傳》中的「君子曰」即「孔子曰」，遂徑改「君子謂」為「孔子聞之曰」歟？

《呂氏春秋》為何以「春秋」名書，歷來眾說紛紜。司馬遷於〈十二諸侯年表序〉列敘孔子、左丘明、鐸椒、虞卿與呂不韋等人作「春秋」之意，齊等五人著書之功業，⁴⁹呂不韋有可能效法孔子作《春秋》褒善貶惡，

頁 12。

⁴⁷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卷 13，頁 439-440。

⁴⁸ 《左傳》「君子曰」／「仲尼曰」的相關論題，可參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頁 91-138；李隆獻：〈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 13 輯（2015 年 4 月），頁 49-68；整理後收入李隆獻：〈玖、《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收於李隆獻：《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頁 425-503。

⁴⁹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

遂將其書名為《呂氏春秋》。⁵⁰如此，則頗可能改《左傳》的「君子曰」為「孔子曰」以彰明孔子與《春秋》的關係。然而《呂氏春秋》中的「孔子曰」並非全出踵承或改寫，如〈義賞〉所載當出《呂氏春秋》自創：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

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

為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邪？⁵¹

晉陽之圍在周貞定王 14 年（西元前 455），時孔子早歿，⁵²不可能對此事有所評論。《呂氏春秋》橫空自造「仲尼」之言，無非借重孔子地位與權威為其理論張本，故在「仲尼曰」之後，進一步就趙襄子的成就點出「賞罰當」的主旨，一方面彰顯孔子的權威地位，一方面加強孔子褒善貶惡的形象。此一褒善貶惡形象之形成，可能源於孔子作《春秋》的事蹟已普遍被接受；唯《呂覽》並未如《孟子》將孔子作《春秋》之事功接續於堯、舜、禹、文王、周公相繼而下的聖賢譜系。

《呂氏春秋》又常敘寫孔子因小見大，洞燭機先的形象，如〈察微〉載：

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

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4，頁 6-8）

⁵⁰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序〉「春秋、素王、大一統」對此議題論述詳審，可參。見〔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 1-9。

⁵¹ 同上註，頁 1493-1497。

⁵² 孔子卒於魯哀公 16 年（西元前 479）。

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⁵³

魯國法令獎勵贖回遭擄至諸侯為奴的魯人，子貢贖人而不取賞金，孔子遂預見魯國此後必因此義行未獲獎勵，將不再有人願意贖人。而子路拯救溺水者，並接受溺水者以牛作為報答，孔子遂預見魯國此後必因可得報償而願意拯救溺水者。贖人、拯溺之事，不見於更早的文獻，或許即為《呂氏春秋》藉用孔子師弟角色創造的故事。其中孔子站在較高的角度，見微知著的預言子貢、子路二人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符合孔子的「老師」／「智者」形象，且其所產生的影響實寓有褒貶意涵。由此可見孔子作為「老師」的形象至戰國末期應已深植人心，且歷久不衰。又如〈當染〉所載：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

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⁵⁴

文中一方面肯定孔子好學，老聃之外，孔子之師又多了孟蘇與夔靖叔，二人並未見載其它文獻；另一方面則是孔子「善教」，其弟子與再傳弟子非唯能遠禍全身，並且能顯榮天下。⁵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老師形象在先

⁵³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879-1881。

⁵⁴ 同上註，頁230-235。

⁵⁵ 〈尊師〉亦載：「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

秦文獻已經確立，但賦予墨子老師形象則頗為少見。孔、墨並稱，且形象逐漸同化，乃《呂氏春秋》之一大特色。

除敘述孔、墨二人好學而善教外，《呂氏春秋》也著意營造孔、墨皆有大才、志於道而不遇，不能一展抱負的形象，如〈諭大〉直言「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⁵⁶而所以欲行道而不成，當因不見用之故，是以《呂氏春秋》屢屢強調孔子的「布衣」身分，如〈不侵〉載：

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⁵⁷

〈順說〉亦載：

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⁵⁸

前引〈當染〉亦云「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一方面強調其布衣、無官無爵的身分，另一方面也藉此表現二人雖為布衣，但擁有極大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以至於君主「不能與之爭士」，而天下「莫不延頸舉踵」。凡此種種，皆有濃厚戰國時代平民崛起的風氣與特色。

相較而言，《呂氏春秋》全然未見作為貴族身分以及捍衛禮樂制度的孔子形象；而作為「良臣」形象的孔子事蹟亦僅一見於〈樂成〉：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

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424-428）〈尊師〉所載類似〈當染〉，而尤著墨於弟子的個性殘暴狡猾或出身盜匪，但因所學得當，故能全身遠禍。

⁵⁶ 同上註，頁1342。文亦見〈務大〉，同上註，頁3047。

⁵⁷ 同上註，頁1191-1193。

⁵⁸ 同上註，頁1730。

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

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⁵⁹

文中雖提及孔子治魯成效，但如何治魯卻非要旨。不同於其它文獻屢屢強調禮樂教化，或因其學說思想特質而塑造善於用法的孔子，⁶⁰《呂覽》此文明顯重在闡述其君賢於任人。「君臣遇合」議題顯為時人關注焦點，是以在敘述孔子故實時，多敘寫其如何自托於君主，或如何周遊求用以闡發其對君臣遇合之理念，如〈遇合〉載：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⁶¹

文中借孔子周遊列國、干君求用事蹟為說，並指孔子不受重用，官僅至魯司寇，故「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可見《呂覽》視孔子為「命世之才」，惜其不逢時運，其大旨頗近於出土文獻《郭店楚簡·窮達以時》：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舜耕於歷山，陶拍於河浦，立而為天子，遇堯也。臯陶衣皂褐，帽經蒙巾，釋板築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呂望為臧棘津，守監門

⁵⁹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855-1862。

⁶⁰ 說可參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三之（三）「道法二家對孔子形象的變創」，頁86-93。

⁶¹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545-1550。

棘地，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舉而為天子師，遇周文也。
管夷吾拘囚桎縛，釋械桎而為諸侯相，遇齊桓也。百里遷蕩
五羊，為伯牧牛，釋板築而為朝卿，遇秦穆。孫叔三謝恆思
少司馬，出而為令尹，遇楚莊也。……窮達以時，幽明不
再。故君子勇於反己。⁶²

〈窮達以時〉舉舜、皋陶、呂望、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等賢臣，遭逢堯、武丁、周文、齊桓、秦穆、楚莊等明君，皆為「有其世」之境況，⁶³此乃由正面論說；《呂覽·遇合》則舉孔子周遊列國而諸侯莫之能用，由反面申論「時不合」。二者皆以為君臣之遇合出於時運，而時運不可期，故唯「審己」而已，是以〈遇合〉言「必審諸己而後任」，〈窮達以時〉言「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勇於反己」，⁶⁴文雖有異，而皆歸本於自身之修持。此二文獻，雖地域懸隔，而有相同之關懷，可見「君臣遇合」議題在戰國時期之普遍性。

《呂氏春秋》又述及兩次孔子主動求用的事蹟，〈貴因〉載：

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眾，何益？⁶⁵

文中以孔子因衛靈公嬖臣彌子瑕引介而得見南子；禹欲推行教化於風俗慣裸之國，必先裸身入其國；墨子雖崇儉非樂，但欲說服楚王亦得投其所好，錦衣吹笙；湯、武如不逢亂世民苦之時，則革命難以成功。以此數例，說明欲成功皆須有所因憑假借，非徒依靠自身能力而已。〈舉難〉亦載：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

⁶²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45，簡文採寬式隸定，通假字逕改為通行字，讀者察之。

⁶³ 「有其世」指合於時運。若時運不濟，雖有賢能之才，仍不得行於世。

⁶⁴ 「勇於反己」的釋讀，參考周鳳五：〈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頁11，註40；收於周鳳五：《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366，註41。

⁶⁵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1765-1768。

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

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⁶⁶

文中以季孫氏把持魯政為背景，孔子欲勸諫而不得入，是以受養為季孫家臣以諫。此事之所以大受訾議，乃因季孫跋扈僭禮，孔子卻躬受其養，豈非助紂為虐？《呂覽》卻藉由孔子之自白，表明欲立功行道，不可拘泥於個人立場與慣常標準，正如欲救溺者不可能不濡濕衣裳、追逐逃亡者不得不急奔。〈貴因〉、〈舉難〉二則故實皆可歸類於「君臣遇合」、「求用」範疇，不同於〈遇合〉以「時運」為遇合條件，呈顯更多主動求用以立功行道的意味。

綜上所述，可以略見《呂氏春秋》的「孔子敘事」與「孔子形象」特色。形成這些特色蓋有二因：一是《呂氏春秋》屬雜家，故書中孔、墨並舉，孔、墨二人形象也有交融的傾向，如敘述墨子亦著墨於其好學善教，甚至也好先王之術。孔、墨並舉最早見於《韓非子》，〈顯學〉援引儒、墨之言互為批駁，以證二家學說俱非，其目的當在藉由抨擊儒、墨，爭取君王採納法家學說。⁶⁷《呂氏春秋》兼容並包的雜家性質，使其採取不同於《韓非子》的方式，並不駁斥儒、墨學說，而是將其吸納消化，亦即《漢書·藝文志》所言「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二是反映平民崛起的時代背景，《呂氏春秋》全然不提孔子的貴族身分，孔子好禮、守禮的形象也全然不加載述。隨著平民崛起，戰國末期士人關注的議題已由學說論爭轉為君臣遇合、行道求用。因此強調統治者任用賢者，且聽從教導的優點，

⁶⁶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2403-2405。

⁶⁷ 《韓非子·顯學》：「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困圍，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戰國〕韓非撰，張覺校疏：《韓非子校疏》，頁1234-1239）

故《呂氏春秋》雖有良臣形象的孔子，但其所盛稱的則是魯哀公之「達乎任人」，孔子如何施行教化反非重點。此外，孔子作為「老師」的形象相當突出，甚至同化墨子，但並非如其它文獻以「師弟問答」的形式來闡明學說，而是表現在孔、墨弟子因其師而得以全身遠禍，甚至顯榮天下的功效，強調從師學習的重要，至於所學何事，則非其關注焦點。《呂氏春秋》尤其強調孔子周流干君而不得重用，或憑藉德行有虧、行為有爭議之人以求行道之事蹟，這同樣出於重視「君臣遇合」議題，也可見時人普遍熟悉孔子之生平際遇，故舉以為例證。《呂氏春秋》並未將孔子聖人化，孔子形象顯為當時游士普遍際遇的投射縮影——雖有大才而不見用，欲行其道而事不成，這可說是戰國末期運用歷史、文化記憶重塑「孔子形象」的具體呈現。《呂氏春秋》處在儒、道、墨、法諸家之後，思想難有突破，綜采各家，並賦予新義，遂成為其重塑孔子形象的創作意圖。

三、《淮南子》「孔子形象」的承轉與特色

(一)《淮南子》成書背景、編纂動機與思想特質

《淮南子》成書之代，史無明文，唯本傳謂建元 2 年（西元前 139）入朝獻內篇之書。其著作目的，則多異說。據《漢書》本傳，文帝元年（西元前 179）安生，八年，安父長以謀反名譽遭誅，文帝封安為阜陵侯，十六年封淮南王，時安十六歲，景帝前元 3 年（西元前 154）吳、楚七國反，吳遣使至淮南，安本欲發兵反，後城守。建元 2 年（西元前 139）獻書武帝，武帝方好藝文，祕愛之。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安謀反事覺，自剄而死。⁶⁸是《鴻烈》一書當成於文帝（西元前 179-157 在位）、景帝（西元前 156-141 在位）之間，時竇太后掌權，行黃老之治。本傳述及劉安門客著書有云：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⁶⁸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第 7 冊，頁 3532-3542。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祕愛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⁶⁹

史遷或因劉安造反受誅自殺而對劉安撰作之事語焉欠詳。蕭公權先生有謂：

今觀〈要略篇〉列舉太公、孔子，以及申子、商鞅等八家學術，二十篇中於儒、墨、名、法、神仙諸言各有所駁正而不及道家，則作者殆陰奉黃老為正統，復「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極其用。……則安著書之用意亦在顛覆時君，其所採之體例亦為兼收眾說。然其宗旨獨重黃老而與《呂氏春秋》相殊者，殆以《鴻烈》成書適當漢代黃老驟盛轉衰，儒家初受朝廷尊崇之際，故偏重虛靜，圖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相抗，藉以收取士民之心歟？⁷⁰

蕭先生推測劉安可能有意與逐漸興起的儒家思想抗衡，也有可能出自政治目的。而這些可能原因都指向其內容偏向道家思想的特質。

綜合以上各家之說，劉安之著書，除可能有其政治目的外，都指向漢初盛行黃老政治思想的背景。牟鐘鑑指出《淮南子》的思想來源有老子、莊子、儒家、法家、陰陽五行說、墨家、黃老著作、《呂氏春秋》等八家，⁷¹而其宗旨則如高誘〈淮南子序〉所言「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與劉文典所言「然其大較歸之於道」相合，⁷²可見《淮南子》雖綜合當時流行之思想，其主旨則明顯傾向道家，陳麗桂先生〈《淮南子》解老〉曾歸納《淮南子》之思想特色云：

劉安及其賓客一方面能深入了解《老子》思想之核心要義，又能配合時代需求，依照自己南方楚地特有風格，轉化《老子》原義，作創造性詮釋。……

⁶⁹ 《漢書·淮南王傳》，〔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第7冊，頁3534。

⁷⁰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10章，第4節「淮南鴻烈」，頁364-365。

⁷¹ 牟鐘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164-168。

⁷²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

《淮南子》全書基於經世尚用立場，對《老子》許多理論顯實、轉化、甚至歧出、改造，應是刻意之創造性詮釋。不論其詮釋成效與《老子》原旨有多少距離，其應用《老子》，而非轉述《老子》思想之用心，明白可見。從《老子》與《莊子》之理論中，走出自我途徑，堅持自我風格，以切合其大時代之用。⁷³

陳先生指出《淮南子》雖雜采各家之說，而終究偏向道家之《老子》，甚具卓識。

(二)《淮南子》「孔子敘事」之取材

《淮南子》的「孔子敘事」較少，其援引的材料也遠不如《呂氏春秋》豐贍。根據筆者粗略蒐羅，其所取資者計有《論語》、《韓詩外傳》、《莊子》、《荀子》、《列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相較於《呂氏春秋》取材於《莊子》的保守傾向，《淮南子》對《莊子》所載的孔子敘事，則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齊俗〉載：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孔子知其本也。⁷⁴

文中「孔子謂顏回」云云蓋出《莊子·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

⁷³ 陳麗桂：《漢代道家思想》（臺北：五南圖書，2013年），頁172、174。

⁷⁴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352。

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⁷⁵

兩相比對，明顯可見《淮南子》少了《莊子》鋪排的故事情節，文意亦略有不同。《莊子·田子方》中孔子之言乃針對顏回對孔子隨物而化感到無所適從而答，是以所謂「吾有不忘者存」，郭象注：「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不冥也。」⁷⁶《淮南子·齊俗》則斷章取義，以孔子猶有不忘者乃人之性，故視孔子為「知其本」。《淮南子》並未因此事蓋出《莊子》之虛構而不錄，反而斷章取義以佐證已說，坐實《莊子》所載孔子言行的真實性。

此外，《淮南子》取材先秦文獻往往省略情節，而以短短數語簡述故實，如〈主術〉載：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⁷⁷

此蓋出自《韓詩外傳》卷5：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天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

⁷⁵ 〔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706-709。

⁷⁶ 同上註，頁711。

⁷⁷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276。

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慤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⁷⁸

相較於《韓師外傳》引人入勝的豐富細節，《淮南子》僅以三句話概述此一故事及其喻義。又如〈繆稱〉載：

紂為象箸而箕子噤，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⁷⁹

此蓋典出《孟子·梁惠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⁸⁰

《淮南子》既省略《孟子》的議論與孔子的言論，而改以「孔子嘆」表達孔子對偶人葬的批判立場，完全忽略了《孟子》憂民的政治主張。〈說山〉亦載：

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⁸¹

〈說山〉所載數例，並不限於孔子事跡，而皆僅以簡單數語點出這些先秦普遍流傳的「故事」，而省略對話與細節，具體可見《淮南子》之敘事特

⁷⁸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頁456-457。

⁷⁹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339。

⁸⁰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1上，頁10下-11上。

⁸¹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526-527。

色。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較之敘事詳盡與情節動人，《淮南子》更著重故實所反映的寓意，而這些有關孔子的事蹟在當時應已廣為流傳，士人也已習以為常，故《淮南子》並不詳加敘述。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之見黏蟬者」、「子見子夏曰：『何肥也？』」二事，前者即《莊子·達生》孔子見承蜩者事，⁸²後者則典出《韓非子·喻老》，⁸³唯見子夏者在〈喻老〉為曾子。此二文獻皆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且俱屬變創敘事，但《淮南子》將其與史實並列，亦可證《淮南子》多視道家文獻載述的「孔子事蹟」為史實，可說幾乎毫無保留地接受，由此正可佐證《淮南子》思想傾向道家的立場。

綜上所述，可見《淮南子》「孔子敘事」取材的兩大特色：一是對道家文獻——尤其是《莊子》——所載述較具變創的「孔子敘事」一概接受，且幾與史實並觀；再者，《淮南子》較著重故事所反映的寓意，而不重視情節之是否豐贍細緻，對先秦流傳的敘事有概括化的傾向。

（三）《淮南子》所載「孔子形象」的特色

《淮南子》的思想立場明顯傾向道家，此一文獻特質的具體反映便是「仲尼曰」／「孔子曰」地位的明顯下降。「淮南子」雖仍借孔子為「評論者」，但在「孔子曰」之後往往又添加「老子」之語，以闡明其道家旨趣，擡高老子地位。如〈道應〉載：

荊有欻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欻非謂柅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欻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⁸² 《莊子·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錙；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639-641）

⁸³ 《韓非子·喻老》：「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戰國〕韓非撰，張覺校疏：《韓非子校疏》，頁 447）

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

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⁸⁴

此則記載亦見《呂氏春秋·知分》：

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任之執圭。

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⁸⁵

《呂覽》亦引「孔子曰」以為論定，但《淮南子》於「孔子聞之曰」之後，復援引《老子》之言以證成其說。《呂覽》之孔子稱善飲非，乃盛讚其知命有勇，《淮南子》則加上《老子》之言，使得此段敘事與「孔子曰」皆成為發揚《老子》哲理的注腳。唯若進一步考察，即可發現其援引《老子》之文實屬斷章取義，《老子》之「無以生為」云云乃指不刻意維持生命，遠勝於汲汲求生、養生。⁸⁶犯險搏蛟，置己身於險境，顯然違背《老子》重生宗旨，由此可見《淮南子》明顯而勉強的綰合之跡。如此編輯可能出自對先前文獻的吸收與利用，其所發揮的旨意雖不合乎道家的正統詮釋，卻可在爭讓儒、道地位上發揮作用，也可見《淮南子》試圖調合儒、道二家的意圖。

⁸⁴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413-414。〔清〕王念孫：〈淮南內篇第十二〉，收於王念孫：《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254，「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條：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為「瞋目」。……又案：「教然」二字當在「瞋目」之上，而以「教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⁸⁵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頁2467-2472。

⁸⁶ 文見《老子》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王弼注：「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晉〕王弼等：《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63）

《莊子》有意識使用「重言」進行創作，並在〈寓言〉、〈天下〉等篇一再提及「重言」，莊子自謂：「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⁸⁷陸德明《釋文》釋「重言」云「為人所重者之言」。⁸⁸意即為了止辯，遂假借名人之口、長者言論，闡述己說以取信於世。《淮南子》雖不如《莊子》虛構孔子故事以為「重言」，但也深知「孔子曰」的效用，如〈脩務〉載：

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⁸⁹

《淮南子》明確指出唯聖人能明辨是非、分判優劣，世人則多缺乏判斷力。故若有新聖人之書出而託名孔、墨，從學者將慕名而來。可見《淮南子》雖有明確的道家傾向，仍意圖借重儒家的孔子作為其理論代言人，故亦常藉「孔子曰」為「重言」敘事。

《淮南子》的道家立場也使其對儒家的重視禮樂有所譏評。同樣採取孔子的「老師」形象，《呂氏春秋》因強調學習的重要而著重於孔門弟子因勤學而受益；《淮南子》則多言孔子弟子因力學而遭弊，如〈精神〉篇載：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

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蒞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⁹⁰

⁸⁷ 語見〈寓言〉，〔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949。

⁸⁸ 同上註，頁 947。

⁸⁹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 657。

⁹⁰ 同上註，頁 241。

文中所舉四人，皆為孔門最優秀弟子，⁹¹然皆不得善終，暗示學儒越深，桎梏越大，乃至逆情傷性，深受其害。此蓋借由世人熟知的孔門師弟，特別著墨於弟子的負面下場，藉以凸顯儒家之弊。

《淮南子》亦針砭儒家汲汲用世的態度，強調儒家僅得學術之一偏，不慮世道之異、時代有別，遂往往適得其反。如〈汜論〉載：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⁹²

文中以孔子、墨子、楊子、孟子之相非，說明各種學說皆各有一得，但也都僅得一偏，正如斤、斧、椎、鑿，功用不同而各有擅場，以此強調融會貫通、適處而用的重要，表現出雜家兼取各家之長的思想特質。為了說明一家之學有其局限，不足遍施於天下，《淮南子》亦以孔子與古聖王為例，強調其雖為聖主、賢相、博通之人，但皆猶有不能。如〈主術〉載：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駱馬而服駒駘；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⁹³

⁹¹ 《論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11，頁1下）

⁹²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436-437。

⁹³ 同上註，頁278。

商湯、周武皆聖明之君，乘舟卻非其所長；伊尹乃賢明之臣，然其能騎術遠不及胡人；孔、墨皆以博通聞名，但入山林、行險阻則非其所長。上述諸人皆為史上最超卓特異之士，而仍有所不能，可見人的能力實有局限，以此比喻各家學說皆未盡完善，實宜兼採各家之長。

相對於各家學說僅得道之一偏，《淮南子》認為「道」乃萬物共通之理，〈齊俗〉有言：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榱桷豫樟而剖裂之，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槌，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⁹⁴

文中以烹牛、剖木為喻，謂雖口味不同，所本皆出一牛；剖木以為器，雖功用不同，所本皆同一木。遂謂百家之言雖旨趣有殊，要皆本原於「道」，充分呈現《淮南子》以道家思想為主幹，吸收各家學派之長的意圖。此種意圖反映在其對理想人格之型塑，如〈人間〉載：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⁹⁵

所載近同《列子·仲尼》，⁹⁶可見《淮南子》與道家文獻的因襲關係。文中藉孔子弟子為說，謂顏回之仁、子貢之辯、子路之勇皆超過孔子，但皆為

⁹⁴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 362-363。

⁹⁵ 同上註，頁 616。

⁹⁶ 《列子·仲尼》：「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122-123）

「一偏之材」，不若孔子之博通兼材又能持守，故能為三人之師。在如此形塑下，孔子的形象近乎聖賢，然而不同於儒家聖人必有事功，道家傾向的《淮南子》認同的則是著重內在修養的道家式聖賢。由此，對於「孔子形象」的塑造實包涵兩個面向：如欲說明各家學說皆有局限，則以博通的孔子尚有不能之事為譬；如欲說明兼容並蓄，則以兼有弟子專才之長的孔子為喻，唯皆不離雜家兼容各家之長的學術宗旨。

尚有可說的是，《淮南子》特別提到魯國行孔子之術，但也因此而「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說見〈齊俗〉：

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勾踐劓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⁹⁷

衡諸史實，孔子於魯執政時日非長，且遭季氏掣肘，恐尚未能使「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⁹⁸此一違背史實的認知或許其來有自，《莊子·田子方》便曾假魯哀公之口道「魯多儒士」、「舉魯國而儒服」：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⁹⁹

由此可見《淮南子》與先秦道家文獻的承傳關係。《淮南子》成書於漢初，其時魯地確已深受孔子及其弟子影響，而有濃厚的儒學風氣。《史記·項羽本紀》載：

⁹⁷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 355。

⁹⁸ 可參魯定公年間之《左傳》與《史記·孔子世家》。

⁹⁹ 〔戰國〕莊周著，〔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陸德明音義，〔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717-718。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
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
禮葬項王穀城。¹⁰⁰

司馬遷特別記載項羽敗亡後，魯地堅決不降的事蹟，除項羽初封為魯公的客觀因素外，「守禮義」、「為主死節」二語也反映了魯地長久浸淫儒家風氣之要因，可見孔子歿後，儒學持續在魯地發展，因而習染儒家的道德風氣，《淮南子》蓋即由此歷史、文化記憶，遂有「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之言。

綜上所述，影響《淮南子》孔子形象與孔子敘事的因素，一方面為其傾向道家學派的立場。孔子作為評論者，以「孔子曰」的形式闡明事理仍是一大表現方式，只是「孔子曰」似乎成為《老子》的注腳，不再代表最終的權威，具體反映《淮南子》對儒、道地位升降的爭讓。儒家重視學習教化的思想也被認為違背自然、殘生害性，反映在孔門弟子「好學」，而適足以造成其「不得善終」的下場。

次則反映雜家欲兼取各家之長，鎔鑄治國之道的意圖。針對先秦諸子汲汲推行自家學說，《淮南子》則站在古今是非各異、南北習俗相反的立場，認為沒有任何一家學說足以遍行天下，而須兼容博取，乃能近於道。是以針對「孔子形象」，一方面著重於其雖天才博通有如聖人，但仍有不能，用以表明各家學說即使良善，仍有不能適用的局限；另一方面，在理想人格的描繪上，則藉由敘寫孔子兼具弟子的一偏之才，表明其學說重視兼採各家之長。此二形象雖看似扞格，但都可推源於同一思想——以兼取調合為美善。

四、結論

透過省察《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的「孔子形象」，可約略歸納幾個論題：

首先，就二書之著作時代與性質言，《呂氏春秋》之成書在秦一統天下之前，呂不韋宜有以此書為治國之企圖，並力圖與秦之以法治國抗衡；而

¹⁰⁰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4。

在雜家「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的宗旨下，運用孔子有助於治國的形象，重新形塑孔子形象。《淮南子》編成於西漢文、景年間，企圖透過一套系統而完整的黃老思想體系，作為治國藍圖，或亦有政治目的，故憑藉其歷史、文化記憶，重新形塑孔子，唯其立場明顯偏向道家。

其次，就二書取材言，所引「孔子敘事」來自各家學派，即使其引述某一學派文獻，也不足以說明二者有思想上的必然關連，而須視其引述的宗旨而定，故難以單純藉由取材來源說明其學術思想傾向。但若考察二書如何處理《莊子》虛構的「孔子敘事」與變創的「孔子形象」，則可知《呂氏春秋》乃有限度的接受，而不選擇過於顛覆性的孔子敘事；《淮南子》則接受《莊子》虛構的孔子敘事，並賦予史實的地位。兩相比較，《呂氏春秋》顯然近於儒家而《淮南子》則近於道家。

再次，二書敘述孔子側重的論題完全不同：《呂氏春秋》探討的主題為「君臣遇合」，孔子、墨子往往並舉，一方面敘寫孔、墨打破原則以干君求用的事蹟，另一方面則又成為能以「布衣」身分顯名四海的代表。如此的孔子形象，似乎寄託了戰國縱橫辯士的普遍遭遇與理想。《呂氏春秋·遇合》更直接援引孔子周流干君，不被重用的遭遇，藉此論述時運與遇合的關係。此一論題，亦見出土《郭店楚簡·窮達以時》，顯現此一論題頗受時人重視。《淮南子》則藉孔子論述各學派得之一偏的局限，以倡導兼取並用的雜家之美，於是其筆下的孔子，皆能與湯、武、伊尹、墨子相提並論，都代表當時最具才智德性之人，然尚有所不能，用以證明任何完善的學說亦可能因時、地之異而無法普遍推行。又以孔子具備弟子的一偏之才，以全德為理想人格的特質，寄寓最佳之學說並非一家一派，而是截長補短，融會兼採。由此可見，同一文獻闡發同一論題之「孔子形象」，仍可因論述角度的不同，而對孔子形象有不同的取捨，因而產生不同的變貌。

復次，二書思想宗旨不同，亦影響了其對「學」的態度：《呂氏春秋》關注「君臣遇合」議題，強調學習的重要，以冀人主虛心就教於賢臣；《淮南子》傾向道家無為自適之道，自對「學」有所譏評，認為為學適足以殘生害性。孔子顯明的「老師」形象，亦成為二書闡述「學」之議題的引證之資。二書同樣以「學」的效用為證，《呂氏春秋》藉由敘寫孔門弟子之顯榮，闡明學習的正面助益；《淮南子》則著墨於弟子之夭病死傷，以證重學之殘性害情。由此可見，說理文獻往往於歷史、文化記憶中各取所需立論，而非以傳述事實為主要目的。

又次，二書之引用「孔子曰」／「仲尼曰」亦頗有可論者：《呂氏春秋》、《淮南子》的「孔子曰」依其用途可分為三類：一是針對事件提出評斷，臧否人物，此一用法與流傳的「孔子形象」相去不遠，《論語》、《左傳》已見許多孔子臧否人物行事的言論，而孔子作《春秋》以褒善貶惡，亦是戰國流行之說，可見此一形象的流行實況，以及孔子作為歷史、文化記憶的無所不在。二是藉孔子之言闡述其學派所欲闡述之事理，而此事理並不屬於儒家學說，此即《莊子》所謂之「重言」。以上兩種用途《呂覽》、《淮南》並見。三則是以孔子之言為《老子》注腳，即在孔子的評論之後，又添加《老子》原文，使「孔子曰」成為《老子》哲理的闡發者，此種「孔子曰」僅見於《淮南子》。雖然此一用法明顯可見綰合之跡，其所闡發的道家哲理也未必為《老子》原意，但如此安排卻可調和儒、道衝突，提高道家地位。無論「孔子曰」的用途如何，顯然孔子成為提供準則的權威者以及應當效法的標準，使用「孔子曰」即是希望讀者服從其論點，即便在學說立場傾向道家的《淮南子》，也意圖避免孔子與老子針鋒相對，而使其相互發明，可見孔子地位越趨權威化的演變軌跡。

綜上所述，可見《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的「孔子形象」並無特殊創發，而皆出於說理的需要，因而有所取捨、偏重。如論「學」則側重其「老師」形象，論說「君臣遇合」則忽略其出身貴族後裔而強調「布衣」身分，可見秦末漢初之際，孔子形象已然成為傳統，難有突破，對孔子之歷史、文化記憶也有窄化的趨勢。此外，由二書「孔子曰」的論述方式觀之，孔子的權威性顯然更為明確而普及，這也使傳統的「孔子形象」益趨穩固，趨於固型，難有突破，必須到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經學與讖緯盛行，孔子形象才有較為鉅大的轉變。

【責任編校：郭千綾、郭美吟】

徵引文獻

專著

- 〔戰國〕呂不韋 Lü Buwei 撰，〔漢〕高誘 Gao You 注，王利器 Wang Liqi：《呂氏春秋注疏》*Lüshi chunqiu zhushu*，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2002 年。

- [戰國]莊周 Chung Zhou 著，[晉]郭象 Guo Xiang 注，[唐]成玄英 Cheng Xuanying 疏，陸德明 Lu Deming 音義，[清]郭慶藩 Guo Qingfan 輯：《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1980 年。
- [戰國]韓非 Han Fei 撰，張覺 Zhang Jue 校疏：《韓非子校疏》*Hanfeizi jiao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年。
- [漢]班固 Ban Gu 撰，[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Shanghai shifan daxue guji zhengli yanjiusuo 整理：《漢書補注》*Hanshu buzhu* 第 6、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年。
- [漢]趙岐 Zhao Qi 注，[宋]孫奭 Sun Shi 疏：《孟子注疏》*Mengzi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6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撰，[日]瀧川資言 Takigawa Kametarō 考證：《史記會注考證》*Shiji huizhu kaozheng*，東京 Tokyo：東京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Tokyo bunka gakuin tokyo kenkyuzyo，1932 年。
- [魏]何晏 He Yan 集解，[宋]邢昺 Xing Bing 疏：《論語注疏》*Lunyu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6 年。
- [晉]王弼 Wang Bi 等：《老子四種》*Laozi sizhong*，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99 年。
- [晉]杜預 Du Yu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左傳正義》*Zuozhuan zheng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6 年。
- [唐]魏徵 Wei Zheng 等：《隋書》*Sui shu*，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74 年。
- [清]王念孫 Wang Niansun：《讀書雜誌》*Dushu zaz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4 年。
- [清]汪中 Wang Zhong 著，王清信 Wang Qingxin、葉純芳 Ye Chunfang 點校：《汪中集》*Wang Zhong j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uichu，1990 年。
- [清]紀昀 Ji Yun 等撰：《四庫全書總目》*Siku quanshu zongm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9 年。

- [清]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撰，葉瑛 Ye Ying 校注，靳斯 Jin Si 點校：《校讎通義校注》*Jiaochou tongyi jiaozhu*，收入[清]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撰，葉瑛 Ye Ying 校注：《文史通義校注》*Wenshi tongyi jiaozhu*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Shanghai shifan daxue guji zhengli yanjiusuo 校點：《國語》*Guoyu* 下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8 年。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suo：《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Beijing daxue cang xihan zhu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 田鳳台 Tian Fengtai：《呂氏春秋探微》*Lüshi chunqiu tanwe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6 年。
- ：《王充思想析論》*Wang Chong sixiang xilun*，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1988 年。
- 江璩 Jiang Quan：《讀子卮言》*Du zi zhiyan*，臺北 Taipei：泰順書局 Taishun shuju，1971 年。
- 牟鐘鑒 Mou Zhongjian：《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Lüshi chunqiu yu huainanzi sixiang yanji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7 年。
- 呂思勉 Lü Simian：《先秦學術概論》*Xianqin xueshu gailun*，昆明 Kunming：雲南人民出版社 Yunnan renmin chubanshe，2005 年。
- 李隆獻 Li Longxian：《晉文公復國定霸考》*Jinwengong fuguo dingba kao*，收入羅聯添 Luo Liantian、徐泓 Xu Hong 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Guoli taiwan daxue wenshi congkan* 78，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weiyuanhui，1988 年。
- 屈守元 Qu Shouyuan：《韓詩外傳箋疏》*Hanshi waizhuan jianshu*，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1996 年。
- 胡適 Hu Shi：《中國哲學史大綱》*Zhongguo zhexueshi dagang*，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47 年。
- 徐復觀 Xu Fuguan：《兩漢思想史》*Lianghan sixiangshi* 第 2 卷，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9 年。
- 荊門市博物館 Jingmenshi bowuguan：《郭店楚墓竹簡》*Guodian chumu zhujian*，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98 年。

- 張光直 Zhang Guangzhi：《中國青銅時代》*Zhongguo qingtong shida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1983 年。
- 張舜徽 Zhang Shunhui：《四庫提要敘講疏》*Siku tiyao xu jiangshu*，收入張舜徽 Zhang Shunhui：《舊學輯存》*Jiuxue jicun* 下冊，山東 Shandong：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8 年。
- 梁啟超 Liang Qichao：《梁任公學術演講集》*Liang Rengong xueshu yanjiangji* 第 1 輯，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7 年。
- 陳奇猷 Chen Qiyou：《晚翠園論學雜著》*Wancuiyuan lunxue za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年。
- 陳麗桂 Chen Ligui：《漢代道家思想》*Handai daoia sixiang*，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2013 年。
- 程千帆 Cheng Qianfan：《閒堂文藪》*Xiantang wensou*，收入程千帆 Cheng Qianfan：《程千帆全集》*Cheng Qianfan quanji* 第 7 卷，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0 年。
- 楊伯峻 Yang Bojun：《列子集釋》*Liezi ji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劉文典 Liu Wendian：《淮南鴻烈集解》*Huainan honglie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0 年。
- 劉咸炘 Liu Xianxin：《劉咸炘學術論集（子學編）》*Liu Xianxin xueshu lunji (zixue bian)*，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蕭公權 Xiao Gongquan：《中國政治思想史》*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sh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1982 年。
- 錢穆 Qian Mu：《先秦諸子繫年》*Xianqin zhuzi xinian*，香港 Hong Kong：香港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daxue chubanshe，1956 年。
- 嚴靈峯 Yan Lingfeng：《無求備齋學術論集》*Wuqiubeizhai xueshu lunji*，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1969 年。
- 〔德〕揚·阿斯曼 Jan Assmann 撰，金壽福 Jin Shoufu、黃曉晨 Huang Xiaochen 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與政治身分》*Wenhua jiyi: zaoqi gaoji wenhua zhong de wenzi, huiyi yu zhengzhi shenfē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李隆獻 Li Longxian :〈《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Zuozhuan ‘Zhongni yue xushi’ chulun”, 《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第 33 期, 2010 年 12 月; 收入李隆獻 Li Longxian :《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Xianqin lianghan lishi xushi yulun*,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7 年。
- :〈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Xianqin hanchu wenxian zhong de ‘Kongzi xingxiang’”, 《文與哲》*Wen yu zhe* 第 25 期, 2014 年 12 月; 收入李隆獻 Li Longxian :《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Xianqin lianghan lishi xushi yulun*,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7 年。
- :〈試論《左傳》「仲尼曰敘事」的經史學意涵〉“Shilun Zuozhuan ‘Zhongni yue xushi’ de jingshixue yihan”,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Jingxue wenxian yanjiu jikan* 第 13 輯, 2015 年 4 月; 收入李隆獻 Li Longxian :《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Xianqin lianghan lishi xushi yulun*,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7 年。
- :〈《莊子》、《列子》中的「孔子形象」〉“Zhuangzi, Liezi zhong de ‘Kongzi xingxiang’”, 《東亞觀念史集刊》*Dongya guannianshi jikan* 第 8 期, 2015 年 6 月。
- 周鳳五 Zhou Fengwu :〈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Shangbowu ‘Guchengjiafu’ chongbian xinshi”, 《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第 25 期, 2006 年 12 月; 收入周鳳五 Zhou Fengwu :《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Pengzhai xueshu wenji: zhanguo zhushu juan*,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6 年。
- 陳志平 Chen Zhiping :〈雜家考論(下)〉“Zajia kaolun (xia)”, 收入方勇 Fang Yong 主編:《諸子學刊》*Zhuzi xuekan* 第 6 輯,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2 年。
- 潘俊杰 Pan Junjie :〈先秦雜家的特徵〉“Xianqin zajia de tezheng”,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Xibe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第 38 卷第 1 期, 2008 年 1 月。

〔美〕柯馬丁 Mattin Kern 著，李芳 Li Fang、楊治宜 Yang Zhiyi 譯：〈方法論反思：早期中國文本異文之分析與寫本文獻之產生模式〉“Fangfalun fansi: zaoqi zhongguo wenben yiwen zhi fenxi yu xieben wenxian zhi chansheng moshi”，收入陳致 Chen Zhi 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古史卷）》*Dangdai xifang hanxue yanjiu jicui (shanggushi j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會議論文集

周鳳五 Zhou Fengwu：〈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Guodian zhujian de xingshi tezheng ji qi fenlei yiyi”，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 Wuha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yuan 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Guodian chuj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武漢 Wuhan：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renmin chubanshe，2000 年。

